

第7章

與女客人衝突中的男性氣質實踐

男性性工作者並不會因為與女客人私人三重關係中的弱勢處境而總是採取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這種非絕對順從的態度使得雙方難免發生衝突，在發生衝突的過程中男性性工作者的男性氣質實踐更加多元。

7.1 拒絕客人「特殊要求」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雖然申哥一再說「不能得罪客人」，雖然很多其他資訊提供者也說面對客人便「沒有尊嚴」了，但是，實際上男公關和女客人之間，並非前者對後者無條件的簡單服從，也並非總是客人有最後的決定權，有的時候便會出現男公關堅持不從的情況。

阿紹便提到：「有時客人提出特殊的要求，先生們（男公關）無法解決，就要請經理來協調了。」具體是什麼要求不能接受，並沒有一定之規。我的觀察是，與男公關當時的感覺，以及對客人的感覺有關。但必不可少的兩點是：首先，這要求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非常少見，絕大多數的客人不會提出來的；其次，對這要求的服從將使男公關實踐極端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我的資訊提供者通常稱之為「女人做的」，彷彿是對「女性氣質」的實踐。雖然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規定了「顧客是上帝」，但是當那特殊的要求極少有客人提出來的時候，便似乎不再是「顧客」的要求了，男公關便有了拒絕的理由。

我在FH遇到這樣一件事，一天晚上，資訊提供者飛飛和另一位男公關在包房裏陪兩個女客人。客人提出，要包房裏的公關先生脫光衣服，拿著性玩具玩。飛飛和另一位男公關不同意。客人就不幹了，說：「你是幹什麼的？我花了錢，你就得聽我的！」事情僵住了，飛飛溜出來向申哥求助。申哥忙進包房，一臉燦爛地向兩位客人問好，解釋說，客人提的那種要求在包房裏是不允許的，公安會管的，包房裏最多是摟摟抱抱。申哥一通花言巧語把客人哄開心了，申哥又送了客人一箱酒，自己也坐下來陪聊，直到客人開心地離去。

客人走後，我與飛飛聊了這件事，我問他：客人的要求為什麼不可以接受，他說：「太過份了！把我弄成脫衣舞女郎了！」「弄成脫衣舞女郎了」，是將男公關直接「貶損」為小姐，這讓我想起阿紹被兩個女人夾著跳舞時說的一句話：「把我搞的像小姐似的。」兩個事件的共同之處是，女客人對於男人「玩小姐」的權力模式的複製過於直接和徹底，完全使用了男人「玩小姐」時的方式來「玩公關」，在男公關看來是在作「女人」（小姐）才做的事情，似乎連從屬趨勢男性氣質的實踐都稱不上了，而是對「女性氣質」的實踐了，所以是無法接受的。可以看到，事件中客人使用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顧客是上帝」，男公關不想服從這符號的時候，便拉進了「公安會管的」這個政府權力符號來進行對抗。但這政府權力又不是直接拉進來的，而是通過請經理出面，由經理拉進來的，所以公關和客人的直接衝突被迴避了，「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維持。

飛飛還對我講了他的另一次經歷：女客人提出來讓兩個男公關親嘴、摸性器官。「這種情況以前有過，兩人會做做樣子，不真的碰上，一笑就過去了。但這次客人堅持，必須做，也就只能找經理來。經理來，也是說，公安會管的」。飛飛說。

飛飛說：「兩個女人那樣可以，因為女人本來就很親近，無

所謂的，但兩個男人那樣絕對不可以。」讓兩個男人實實在在地實踐男性間的性親暱，做「兩個女人那樣可以」的事情，同樣將男人貶為非男人。對這些要求的抗拒後面，是同性戀恐懼，是對男性親暱的迴避。如果客人認同於「做做樣子」，便會達成一種妥協，但這次客人堅持要求以往沒有過的「實質接觸」，屬於「特別」的了。

可見，當女客人的要求將男公關女人化，而且超出性產業從業情境的常規，雙方就僵住了，這時找第三方（經理）來解決，迴避了男公關直接對抗女顧客。而經理來處理的辦法，就是用政府管理的符號化解這一矛盾。這就彷彿我們前面分析圍繞口交的衝突時，因為加入了「情感」這個符號，使得部分衝突得到解決。新符號引入的成功，還取決於雙方的妥協。這一過程中的妥協與協商，是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在互動中的實現。此時，男公關實踐著剛性／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剛性趨勢表現在男公關的堅持上，關係均衡趨勢表現在雙方的最終妥協一致上，而不是完全的從屬趨勢男性氣質實踐。

7.2 拒絕出街時的男性氣質實踐

陪酒（坐台）與出街，是兩個不同的層次。幾乎沒有資訊提供者說他們會拒絕陪某個客人喝酒，但是，有人會拒絕出街。阿京陪喝酒的客人中有許多是「又老又醜」的，但是，他不願意陪這樣的客人上床。即使是管理者申哥，也常陪客人喝酒，但FH的人都相信，申哥從來不陪客人出街。

男公關不想出街，是對「顧客是上帝」這一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違背。與前面提及的客人的「特殊要求」不同，因為「出街」不是特殊要求，而是基本的性產業從業行為。所以如果說面對「特殊要求」時男公關可以直接說「不」，並且找第三方（經

理) 來處理以避免與客人直接衝突的話, 那麼, 當他們不想出街的時候, 男性氣質便無法通過那種「剛」的方式來實踐了。

幾乎深圳所有的資訊提供者, 均講過他們有拒絕出街的時候。我得出的印象是, 那些自由流動、等電話的男公關, 他們拒絕出街的時候較多; 固定夜場的男公關拒絕出街的時候較少, 而酒吧類營業場所中的男公關, 很少、甚至沒有拒絕出街的時候。自由流動的男公關, 受約束最少, 而酒吧等場所的男公關, 受管理者的約束最多, 固定夜場的男公關居於兩者之間, 雖然可能沒有明確的條文來約束他們, 但在夜場中的業績、同行間的競爭、與管理者的關係等等, 均是他們在決定出街與否時不能不考慮的。

即使在拒絕出街問題上最具自由度的男公關, 他們也沒有人會直接了當地說自己不願意出街, 而是發展出了一套策略來使拒絕變成一件可以被接受的事情, 一件「不得罪客人」的事情。

阿雲說:「拒絕出街的時候, 我通常說今天身體不舒服。當然, 她們知道這個是藉口, 但讓她們有面子呀。」這裏面的關鍵是解決「面子」問題, 「有面子」便是不去直接對抗「顧客是上帝」的符號。另外, 女客人女性氣質的實踐也使得男公關的這種逃避成為可能, 因為很少有女顧客會像男人找小姐時那樣死纏硬打, 非讓某人出街不可。

阿京對這一原則便掌握的爐火純青, 他說:「太老的, 就不願意接。」那麼, 如果有太老的客人點了他怎麼辦? 阿京說:「我上來就叫阿姨。」

如果客人當了「阿姨」仍然要和阿京出街呢, 他說:「有許多辦法迴避, 主要是裝醉。沒喝醉也裝醉了, 倒在沙發上就睡。有時還打電話給朋友, 說我醉的不行了, 快來接我回去。客人看我都醉的睡著了, 就沒興趣叫我出街了。」

可見, 男公關迴避出街時, 均實踐柔性趨勢的男性氣質, 而

不會以「剛」的方式拒絕。

與男公關不同，作為管理者的申哥在拒絕客人要他出街的要求時，則實踐著剛柔相濟／關係均衡趨勢的男性氣質。申哥說：「有一個客人拿了五千元放在桌面上，讓我出街。我說：『我就值這五千呀，你給我五萬吧！』她不可能給五萬。」

另外一個現象是，男公關將「拖延首次出街」作為一種手段，以獲得更多的經濟利益。阿京對我講過，如果一位剛認識的客人要他出街，他往往會推說「今天有事」、「今天醉了」等等。阿京說：「她沒有得到我，就總會找我，坐一次台就賺五百元，有時還會多給，幾次下來錢就不少了，而如果出了街，她得到了，就不會再找我了。所以，還是這樣上算。而越吊著，沒有得到的就越想得到，她就越來勁兒，這樣吊一段時間，再出街，價錢也好談了。而且，幾次這樣的交往後，也有感情了。」「有感情」的意義，我們後面將專門分析。當然如果遇到客人是偶然來的，公關就不敢「吊」了，免得沒吊成常客，當次交易的機會也丟了。關於「吊客人」，我們還將在與臺北男公關的比較時談及。

7.3 言語背後的權力與男性氣質實踐

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顧客是上帝」的符號之下，「討好客人」便非常重要了。揚揚說：「作公關這行就是為了哄客人。」阿京說：「深圳是要動嘴的，不會說話不行。」「會說話」顯然是指的會說讓客人高興的話。在這一點，臺灣和大陸的男公關是一樣的，臺北的男公關肖力就對我說，做這行之前他就「挺會說話」，做這行後，「更會說話了」。哄客人主要是在包間裏，阿起說：「如果把客人哄高興了，哄開心了，不一定退場時才給你錢，隨時可能拿出錢來給你。」「哄」與「給錢」，是相互促進

的。

但是，仍然有資訊提供者說錯話得罪客人的時候。每一個情境中均有自己的符號，將不屬於這個情境的符號引進來，可能會打亂此情境內的穩定。男公關在陪女客人聊天時的「說漏嘴」，便是將一種不屬於該情境的符號引進了該情境，並在那瞬間實踐了一種不應該於此時此地實踐的男性氣質。

飛飛便有這樣一段經歷：

有一次我就說漏嘴了，那個女人特壯，我說了句「你身材好結實呀」，那客人還好，沒發脾氣，只是掉下臉說：「小夥子你蠻會說話呀。」我馬上意識到自己說錯了，忙道歉，說「開個玩笑」。

飛飛承認「說漏了嘴」，即不小心說出了心中所想卻不應該說的話。「你身材好結實呀」，是對客人傳統女性氣質的一種貶損，「結實」、「壯實」，這些辭彙是用來形容男人的，而用來形容女人時等於在說她「不像女人。」更重要的是，男人評點女客人的身材，在社會性別秩序三重關係下是合情合理的行為，即在三重關係中占優勢地位的男人觀看、評論（包括貶損）女人，這是一種支配趨勢男性氣質實踐。但是，在性產業從業情境中，女客人在私人三重關係中占了優勢，處於劣勢中的男公關完全沒有資格像飛飛那樣「評點」女客人的外表。他在「暈乎乎」中，未能清晰地識別情境，所以才錯誤地在不屬於此情境的符號下進行了男性氣質的實踐。在一定意義上，這也是一種挑戰客人權力位置的試探，起著權力博弈的作用。但是，這是一種危險的遊戲，只能借著酒勁兒來實現。

面對飛飛的「挑釁」，女客人可以有三種反應，一種是激烈的怒斥，這將使權力關係的鬥爭鮮明，雖然註定客人會勝利，但

這一晚上的情緒也會被破壞；另一種是置之不理，而這與客人在私人三重關係中所具有的優勢地位不相吻合；所以，這位客人採取了第三種方式，即含蓄地說出了自己的不滿：「小夥子你蠻會說話呀。」而其語氣，完全可以表示自己的態度，背後潛藏著另一句話任何人都可以聽出來的話：「想想你在和誰說話！」

有學者論述說：「使用語言是為了達到一定的影響，或支配他人的行為與想法。但是因為這種支配趨勢的欲圖非常容易讓人反感，使談話過於具有權力鬥爭色彩，所以人們會在交談中採用一種『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策略，通常是用間接的談話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圖」(Bradac, 1993)。我們看到，這位女客人便使用了這一技巧。

在女客人的回擊面前，作為男公關的飛飛，或繼續原來的話題，或對客人的反彈置之不理，但這都不符合他在私人三重關係中的位置，不符合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所以，他的反應是慌忙道歉。

有學者說：「對於『去政治話』的談話策略，在權力關係中居於上風的人使用，起到的效果會比較好，立即引起居於下風的人的重視」(胡幼慧，1996: 84-85)。我們這裏看到的個案，便是一個實例。

再來看飛飛講的另一次經歷：

還有一次，也是包房 喝酒時，那位女人臉上有一個大痣。我喝的暈乎乎的，說：「你怎麼這麼大一個痣呀，好難看呀。」旁邊幾個陪酒的兄弟忙幫著打圓場，說：「你錯了吧，沒這個痣就不好看了，就是因為有這個痣才好看呢。」客人笑笑，沒說什麼。

包房 幾個兄弟間會有默契，誰出了錯，大家都會幫忙。如果有一個人錯大了，客人生氣了，大家就全完

了，誰也別想拿到豐厚的小費了。

這個例子中，又是「喝的暈乎乎」時說的話，但因為第三方的及時介入避免了事態的升級。擔心「客人生氣」，就是擔心在私人三重關係中處於優勢的一方對劣勢一方的挑釁進行嚴厲處罰，而避免方式就是在男性氣質上做出相應的實踐。正是在這樣的共同利益中，其他在場的男公關，不等客人說話就出來自行打擊對三重關係中優勢一方的挑戰了，而飛飛也迅速認識到自己在做著什麼，還對其他人心懷感激：「大家都會幫忙裏裏」

飛飛以上二次男性氣質的實踐，是在社會性別秩序之下進行的，但挑戰了性產業從業情境中與客人私人關係中的權力結構，幸好二位女客人的女性氣質實踐均不太「強勢」，使得事態沒有擴大。

即使曾說如果客人太刁難自己「抬腿就走」的阿京也承認，有時是必須忍受的：「比如客人聊著天，喝著酒，哪句話說的不得體了，她就立即翻臉：『你算個什麼東西，不就是一個作鴨的嗎，我拿錢就能砸死你！』公關這時也只能陪著客氣，說：『對，您說的對，我沒有什麼了不起，我賺的就是這份小費裏裏』」話說的「不得體」，便是違背了說話時的情境，通過這「說話」實踐著不應該在當時當地實踐的男性氣質，所以自然要陪著客氣承擔責任了。

與前面飛飛的例子不同的是，在阿京講的例子中客人使用的語言是沒有「去政治化」的，而是以強力在直接行使語言中的權力。這種時候，男公關要做出的反應則不能是輕描淡寫地以「開個玩笑」作為託辭來「道歉」了，一句「您說的對，我沒有什麼了不起，我賺的就是這份小費」使我們看到，在這樣的符號交鋒中，當客人直接使用語言中的權力，男公關就要表現出更大的「服軟」，充分地顯示柔性／從屬趨勢的男性氣質實踐。

我自己做社區考察期間，沒有遇到過客人和男公關翻臉的事情，聊天時偶爾會有一些小的不愉快，但都會被打叉過去。所謂「打叉」，和飛飛同伴的「打圓場」是一個意義，均是立即將兩種不同的符號分隔開來，使其衝突被忽視，從而使現場迅速恢復到它原本應該有的樣子。這樣客人才能玩好，而公關也才有錢賺。

也許正因為雙方，特別是夜場中更占優勢地位的女客人一方，充分理解這兩種符號的矛盾，所以在遇到兩種符號交鋒時，會共同默契地採取妥協、迴避的態度，彼此讓一步，避免衝突升級。當然，這種讓一步，通常更需要男公關先做出。

衝突出現時，女客人掌控有更大的決定它是否繼續發展的權力，在面對男公關的首先退讓時，她是否也做出妥協。如果她決定不妥協，男公關想退讓也沒有機會。富哥便對我講過一次女客人打男公關的例子：

客人打了陪酒的小子，據說人家一巴掌把鼻子打出了血裏裏

那晚的客人都是30多歲，有一個女的當時好像很不高興，很橫的樣子。

經理給賠了禮、道了歉，然後那幫客人就買單了。大家在聊天時說一兩句讓人不高興的話不是什麼大事，主要是那個女的心情不好。

這種事在那種場合不算什麼大事，不是經常，但也不足為怪，在那種場合，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大家都麻木了裏裏

我們從上面這段話中看到的資訊是：「聊天時說一兩句讓人不高興的話不是什麼大事」，但是，「那個女的心情不好」便決

定了事態後來的發展，「橫」是剛性／支配趨勢女性氣質的實踐。客人翻臉的結果註定是男公關一方更多地退讓，「經理給賠了禮、道了歉」；從情感上來講，當時同樣是男公關的富哥並沒有譴責女客人的行為，而是說「大家都麻木了」。麻木的背後，不僅是對私人三重關係中女客人優勢地位和性產業從業情境符號的認可，也是對自己將不同的符號引進此一情境中的責任的自覺承擔。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約略看到，語言的使用是一種複雜權力關係的運作，「言語對話不僅是反映參與互動者彼此的權力位階關係，同時也是一權力角力的互動空間。參與者以言談互動的同時，也正是互相再建構及協商彼此的權力地位關係的時刻」（胡幼慧，1996: 84）。

我們看到，不同的衝突情況會有不同的應對可能，其複雜性與多樣性便是男性氣質實踐的複雜性與多樣性。社會性別秩序的三重關係，與私人關係中的三重關係，無疑對男性氣質的實踐發揮著影響。但是，權力關係並不會導致簡單的一方對另一方的服從，也沒有簡單的角色扮演，男性氣質完全是一種在具體情境下的實踐中的建構，而非權力決定的。

同時，在我們分析男公關和女客人的衝突時，還不能不考慮空間與性別的關係。空間中是存在性別的，有些空間是男人的，有些空間是女人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公共空間是屬於男人的，私人生活空間被建構成女人的。夜總會這種空間，通常是男人的。當女人進入一個常規的男性空間的時候，種種不諧調出現了。更何況，二者在此空間的「工作」也是違反傳統的社會性別秩序的，即原本應該是男人購買女人的性服務，而在男公關和女客人間成了女人購買男人的性服務。「工作並非性別中立，而是被塑造造成適合男人或女人的工作，構成和維繫工作的整套社會實踐被

建構出來，以便體現為社會所認可但多變的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特徵」(McDowell, 2006: 182)。影響女客人處理男公關的拒絕與「挑釁」的因素中，無疑具有這些空間性質對她們的影響，當處於「男人空間」時，女性即使在私人三重關係中居於優勢，也受著此空間內的性別壓力作用。